

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

赵焜昱, 李正栓*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DOI:10.61369/EST.2026070024

摘 要：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以凝练笔法勾勒战争图景，其意象体系集历史典故、政治隐喻与地理实指于一体。本文基于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选取代表性的布洛克与陈志让、黄雯、许渊冲、李正栓四种代表性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求真”与“务实”为评价视阈，探讨译者在处理核心意象时的行为博弈。研究发现，在“黄粱”、“红旗”等关键意象的翻译中，各位译者因身份定位和诗学上的美学追求差异，分化出直译求信、文化解释及审美重构等不同趋向，展现了革命诗词外译中译者社会角色的复杂性与动态平衡。

关 键 词：《清平乐·蒋桂战争》；译者行为批评；革命诗词英译；求真务实

A Study of Translator Behavior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Qingping Yue: War between Jiang Jieshi and the Guangxi Warlords”

Zhao Kunyu, Li Zhengsh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Mao Zedong’s “Qingping Yue: War between Jiang Jieshi and the Guangxi Warlords” employs a concise style to delineate the landscape of warfare, with its imagery system integrating historical allusions, political metaphors, and geographical references. Guided by Zhou Lingshun’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representative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Bullock and Chen Zhirang, Huang Wen, Xu Yuanchong, and Li Zhengshuan, using the “truth-seeking” and “pragmatic” continuum as the evaluative framework to examine translators’ behavioral negotiations in rendering the core imager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he translation of key images such as “yellow millet” and “red flags,” the translators, owing to differences in their identity positioning and poetic-aesthetic pursuits, diverge into distinct tendencies including literal translation for faithfulnes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thereby demonstr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 balance of translators’ social roles in th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revolutionary poetry.

Keywords： “Qingping Yue: War between Jiang Jieshi and the Guangxi Warl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volutionary poetry; truth-seeking and pragmatism

引言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瑰宝，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纪实性与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些诗词蕴含了毛泽东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思想，历来都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素材。”^[1]《清平乐·蒋桂战争》创作于1929年秋，生动记录了红军利用蒋桂军阀混战之机，在闽西开辟根据地的历史瞬间。全词上阕勾勒“军阀重开战”的动荡乱局，下阕描绘分田分地的革命气象，语言凝练，意象深远。其中，“红旗”“黄粱”等极具中国古典文化意蕴与特定革命隐喻的意象群，对跨文化翻译构成了显著的语言与认知障碍。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探究该词的英译策略，对于推进红色革命文化经典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当前，学界对毛泽东诗词英译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译本的语言学分析，如归化与异化策略、美学意蕴在译文中的再现，如三美原则，或单视角的政治话语传播效果考察。然而，将译者从纯粹的语言转换还原为具有多重社会属性的社会角色，并以此来审视其翻译行为的深层动因，仍有较大的探析空间。具体到《清平乐·蒋桂战争》的英译研究，大多学者多倾向于个别译者版本的点评，而缺乏对不同译者群体在面临相同革命文化与历史意象时，其策略分化的系统性对比。这为本文从译者行为视角切入提供了明确的研究切口。

针对上述研究空白，本文以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将译者视为兼具语言性与社会性的行为主

作者简介：赵焜昱，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英美文学。E-mail: 296087421@qq.com

通讯作者：李正栓，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学。E-mail: zhengshuanli@126.com

体，提出“求真”与“务实”这一连续统评价视阈。“求真”要求译者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历史语意与政治符号的固定内涵，而“务实”则强调译者对目标语读者审美期待、出版赞助人规范及社会语境的积极顺应。任何翻译行为，都是译者在“求真”边界与“务实”需求之间不断权衡、博弈的产物。以此为分析框架，可以更深刻地揭示译者在处理“红旗”、“黄粱”等典型意象时所做出的差异化决策背后的主体动因。

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外已历经数十年发展，从早期零星的政治性译介，逐步演变为涵盖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及翻译学的系统化学术领域，中外学界在译本比较、诗学重构与意识形态传递等方面形成了持续对话。对比语料主要来源于收录于李正栓与南方主编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比录》中的六种代表性英译本，译者分别为，李正栓、布洛克与陈志让、巴恩斯通与郭清波、黄雯、许渊冲和赵甄陶。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译本进行分析，其中四种译本布洛克与陈志让译本、黄雯译本、李正栓译本、许渊冲译本都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

一、研究背景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伴其一生，且随着逐渐发表和英译为各国读者所熟知。”^[2] 其独特的古典词学形式与鲜明的革命政治意涵，在跨文化传播中始终面临着文学审美与历史叙事之间的深度张力。尤以《清平乐·蒋桂战争》为代表，该词的多语种译版本集中呈现了译者在面对“红旗”、“黄粱”等核心意象时所做出的差异化策略选择，这恰好为运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深入剖析译者在“求真”与“务实”连续统上的动态博弈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提供了极具典型性的文本场域。当前学界关于毛泽东诗词英译的译者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周领顺提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理论框架下展开实证分析。李正栓团队为该领域核心产出力量，高频聚焦于许渊冲译本及《沁园春·雪》《清平乐·六盘山》等经典名篇。研究内容已从单一译者的策略考察，延伸至译者群体行为、修辞策略、互文性对比等多个维度。相关成果主要由近五年（2021－2025）的 CSSCI 期刊与硕博论文构成，表明该理论视角在红色革命诗词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极强的适用性与学术活力。

（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翻译行为’是再现原文意义的语言转换行为，即是说，翻译行为只能是‘译者’这一身份和角色进行翻译的行为。”^[3] 然而，“翻译阐释意义，但意义却不限于文本意义。”^[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并未将研究视野局限于这一静态、单向的语言学转码过程，而是进一步将译者视作置身于特定社会场域中的行为主体。周领顺因而提出了“求真”与“务实”的连续统评价视阈，旨在动态考察译者行为的社会属性。“译者行为批评是一种评价性的理论工具，简单地说是用于事后评价，因而需要采取条分缕析的描写做法，而‘连续统’就是这样一种视角和做法。”^[5] 这种基于“连续统”的事后描写法，为考察翻译行为提供了一个兼具动态性与包容性的评价框架。其核心突破在于，它打破了将译者仅仅视为语言使用者的单一认知，强调译者必然同时具备社会人的身份属性，即译者的每一次取舍，不仅受制于源语文本的语言规约，更受制于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导向、出版机构的意志，以及目标语读者的诗学以及美学期待。具体到《清平乐·蒋桂战争》的英译实践中，该词集古典典故、地域地理与红色革命话语于一体，其“红旗”、“黄粱”等核心意象在跨语言转换时，天然

存在着语言准确与传播效力之间的深层矛盾。译者究竟是倾向于对原词历史语义与革命符号的绝对地求真，还是倾向于向英语读者文化审美与阅读顺滑度文化趋向性务实，均可以在该理论的连续统上找到清晰的行为坐标。

《清平乐·蒋桂战争》作为一首兼具古典词律之美与革命叙事之重的作品，词中的“红旗”不仅指代物理旗帜，更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图腾，“一枕黄粱”则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隐喻。倘若译者一味追求语言上的求真，可能使英语读者遭遇严重的文化隔阂，倘若过度追求社会趋向务实，则可能消解原词的历史严肃性与革命立场。因此，唯有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的框架，我们才能揭去译文表象，深入探寻不同背景的译者在面对这类高度政治化意象时，其策略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这也正是本文选择以该词为个案，进行译者行为批评实证分析的核心逻辑起点。

（二）《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史诗性

该词写于1929年秋，当时蒋介石与桂系军阀为争夺华中统治权而兵戎相见。毛泽东率领红军趁隙向闽西挺进，在龙岩、上杭等地建立工农政权。全词上阕写“军阀重开战”的乱局，下阕写“分田分地”的革命气象，对比鲜明。“金瓯”等词承载着传统家国观念，“红旗”则熔铸了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色彩。这高度政治化的意象群，构成了翻译中难以直接对等的文化硬核。这首纪实性极强的诗史与战歌，不仅是革命历史的重要文学注脚，更是跨文化翻译场域中极具典型性的文本客体。正如题解所表明，该词虽以蒋桂战争为题，但诗人的主旨并非单纯描写战争，而是借战争局势的突变，指向革命力量正在迅猛发展的宏大政治叙事。

词中丰富的古典隐喻与现实政治符号相互交织，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往往缺失直接的对等物，这种隐性的跨文化错位，恰好为运用“求真－务实”连续统深入剖析不同译者群体的策略差异，提供了丰厚的实证土壤。在厘清该词的创作语境与历史意涵后，本文后续将转入对其核心意象系统的分层解析，并从译者身份与目标受众的差异化定位切入，为四种代表译本的对比分析搭建起完整的阐释链条。

二、意象符号解码

《清平乐·蒋桂战争》这样一首浓缩了革命历史诗篇，包含

着很多深厚的中华文化色彩意象。它以古典词牌为体，虽仅聚焦于一时一地的军事变局，却凭借寥寥数十言的凝练笔墨，折射出中国革命从军阀混战到工农武装割据的宏大演进脉络。全词在写实与抒情交织中，勾勒出恢弘的时代画卷，并内蕴着坚定的革命政治立场。“在新时代背景下毛泽东诗词的对外传播中，若译者对原文理解不当而错误表达，就会歪曲原文意象，甚至损害毛泽东的形象。”^[6]所以译者在解释原诗词意象时要多加理解原文意境，该词的意象系统可从两个维度加以解码，一是承载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政治隐喻意象，二是凝结着古典文化底蕴与地理真实的自然典故意象。这两类意象在跨语言转换中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翻译困境，构成了译者“求真”与“务实”行为的核心区域。

（一）革命政治意象隐喻

词作中的革命政治意象，以“红旗”与“风云”最为典型，它们是词人将抽象的政治信念与阶级立场进行具象化表达的审美载体。“‘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生动地写出了红军兵力集中、势如破竹的英雄气概。”^[7]“红旗跃过汀江”中的“红旗”，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军队旗帜，更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符号意味的隐喻。在毛泽东诗词中此类意象多见，“毛泽东共创作12首包含旗帜意象的诗词，从1927-1936年创作了八首，记录了十年间的革命斗争，另外四首诗创作于1949年以后。”^[8]根据该词题解，此处“红旗”实为代指红军，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力量。诗人在此处用“跃”字，赋予了红军势如破竹、快速挺进的动态画面感，将革命事业的生命力与不可阻挡性外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场景。同样，“风云突变”中的“风云”也是极具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政治气象词，此处借自然天气的骤变，隐喻1929年政治局势突然发生变化，将历史舞台上的博弈浓缩于一个自然现象之中。诗中的“军阀”就是指代国民党新军阀。

（二）自然与典故意象溯源

如果说革命政治意象构成了词作的灵魂，那么自然地理意象与历史文化典故则构成了词作的血肉与骨骼。首先是自然地理意象，包括“汀江”、“龙岩”、“上杭”等真实地名。这些地理专名承载着该词作为红军开辟闽西红色区域的诗史的纪实特质。“汀江”是福建西部流经上杭等地的真实河流，进入广东省境内。龙岩、上杭则是著名的历史坐标，龙岩在福建省西南部，上杭是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根据地之一，著名的古田会议就是在上杭的古田镇召开的。

其次是历史文化典故意象，尤以“一枕黄粱”与“金瓯”最为突出。“一枕黄粱”典出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卢生在邯郸客栈的一枕黄粱美梦中享尽荣华，醒来时灶上的小米饭尚未煮熟。该典故虽滥觞于唐代《枕中记》，然在明朝汤显祖《邯郸记》的推动下，方成为后世通用成语，故亦常有学者将其与《邯郸记》并置考察。该意象在词中用来讽刺国民党新军阀凭借武力妄想统一全国的图谋，不过是白日做梦。“收拾金瓯一片”中的“金瓯”，原指金制器皿典故出自《南史·朱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代指完整无缺的国土，后引申为完整坚固的国土。此处诗人反其意而用之，即旧中国因军阀割据导致“金瓯”破损，红军正努力收回其中“一片”进行土地革命。诗中

“分田分地”即指代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

三、多译本对比分析

《清平乐·蒋桂战争》中蕴含的政治隐喻意象、文化典故意象与自然地理意象已经进行了符号解码。然而，当这些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与革命政治色彩的语言载体进入英语世界时，必然面临着文化差异与诗学传统的双重考验。在《清平乐·蒋桂战争》诗词英译中，许渊冲、李正栓、布洛克与陈志让、黄雯四种译本最具代表性，以这些代表性译本为语料，从文化意象传译与格律表达重构两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揭示译者在面对同一源语文本时，其从语言使用者到其所处的社会角色中的双重身份如何在“求真”与“务实”的连续统上做出各异的动态抉择。

（一）文化意象传译的求真与务实

在跨文化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处理往往是最具有挑战性的环节。《清平乐·蒋桂战争》中高度政治化的符号与古典意象，在英语语境中缺乏直接对应的语言能指。四位译者因其社会身份定位与目标受众的差异，在处理这些意象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

在历史文化典故意象层面，差异尤为显著。首先，“一枕黄粱”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负载词，其物质载体“黄粱”实指“小米”，其含义是指在一枕黄粱做美梦，醒来灶火上的小米饭依旧没有煮熟，形容白日做梦。据植物学与历史地缘考证，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一带是最早种植这一谷物的地域之一，唐代卢生在邯郸道上的“黄粱一梦”正是基于此地理民俗，并且在明朝汤显祖改编的《邯郸记》的推动下“一枕黄粱”这一词语广传于中华大地。对于《清平乐·蒋桂战争》这一诗中的这一词语，四种译本的处理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先看李正栓和许渊冲的译文：

Qing Ping Yue
(War between Jiang Jieshi and the Guangxi Warlords)
Autumn 1929

Sudden veer of wind and rain:
The warlords are at war again.
They cause people to complain
And have an empty dream again.

Over Tingjiang River our red flags leap;
To Longyan and Shanghang we sweep.
We regain part of the golden bowl,
Busy distributing land with frisky leap.

（李正栓译）

THE WARLORDS FIGHT
Tune: “PURE SERENE MUSIC”
1929

A sudden burst of wind and rain:
The warlords fight again.
Sowing on earth but grief and pain,
They dream of reigning but in vain.

O'er River Ting our red flags leap;
To Longyan and Shanghang we sweep.
A part of golden globe in hand.
We're busy sharing out the land.
(许渊冲译)

许渊冲与李正栓的译本处于求真与务实平衡的部分，分别传译为“dream of reigning but in vain”和“empty dream again”，直接点明军阀争权终成空梦的政治讽刺，突出了其文化内涵，让译入语读者能够读懂。在政治象征意象层面，以词中的核心意象“红旗”为例，四种译本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典型的差别是基于国内外文化上理解的差异。李正栓、黄雯、许渊冲三人统一采取了高度求真的字面对等，均译为“red flags”，坚守了“红旗”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符号的物理形象，所代表出的也是李正栓在翻译上所遵守的忠实对等理念。布洛克译文如下：

Advance to Fukien
to the melody of Ch'ing P'ing Lo
September or October 1929

A sudden wind gathers clouds
As warlords renew their clashes
And a pillow of dreams of fortune,
Only to spread hatred among men.

Over the Ting River
And straight to Lungyen and Shanghang
Are carried the crimson banners.
A part of the realm has been recovered.
And the land is being actively redistributed.
(布洛克与陈志让译)

布洛克翻译的观点在于“他翻译时反对‘平滑’，注重力量和节奏。因此，他表示在英汉语言差异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简短有力的诗行，避免使用多音节词，保留原诗节奏特点。”^[9]所以，在这译本中，译者选择短促有力的韵脚，避免冗杂。布洛克与陈志让的译本选择进行求真处理，译为“pillow of dreams of fortune”，保留了枕的意象却去除了小米的物质性，是一种服务于英语读者理解力的务实退让，但缺少了原诗歌当中的意象以及文化负载，为了表达含义而完全抛开原文语境。句式结构上与原诗不对等，在第二诗节可以明显看出。布洛克与陈志让选择了“crimson banners”的译法。在英语语境中，“flags”更为中性

直观，而“banners”往往带有古代军阵古典色彩，指“旌”。布洛克却在政治语境中模糊了红旗作为特定阶级革命符号的唯一性与权威性，且“crimson”其本意为猩红色比“red”颜色更深，使其缺少了在原文基础上的语境对等，与原词中极具政治仪式感的红色存在明显的色彩语义错位。这种在色彩与词汇上的归化改写，实质上是一种过度依赖目标语诗歌语境、偏离译者行为中求真底线的策略，使译本在视觉符号上与原作的政治化语境脱节，造成了“不真”乃至“不信”的翻译效果。而且，“a pillow of dreams of fortune”这种实际含义是“一枕头的发财梦”的说法是一种不真不信的表现，曲解了原诗歌所表达的实际含义。黄雯译文如下：

The War between Chiang and the Kwangsi Clique
after the tz'u 'Ching Ping Lo'

Sudden veer of wind and rain,
The warlords made war again,
Miseries to shower through the land:
Yet another Golden Millet Dream of the brain.

But red flags leap over the river Ting,
Taking in their stride Lungyen and Shanghang,
Mending a fragment of the Golden Vase,
We are now truly busy sharing out land and holding.
Autumn 1929
(黄雯译)

黄雯则展现了不断趋向于“求真”一端的态度，坚持将“黄粱”译为“Golden Millet”，其整句译文“Golden Millet Dream of the brain”却存在明显的语义缺失。对于毫无中国古典文化背景的英语读者而言，“Golden Millet”其本意为金色小米与“Dream of the brain”本意为大脑中的梦，两种本意之间既缺乏常识性的逻辑关联，又无法通过字面直译传递出原典故中的短暂的白日梦的深层隐喻。这种过度拘泥于字面解析的求真策略，反而导致译句晦涩难懂，背离了原诗歌中语义跨文化传播的务实一端。

综上所述，四位译者在文化意象的传译上呈现出清晰的行为光谱。李正栓与许渊冲在典故“黄粱”上选择词义虚化或意译，成功将讽刺军阀的政治内核传递给英语读者，体现了在内容层面的适度“务实”导向，而且，在“红旗”等核心政治符号上，他们又坚守字面对等的“求真”立场，体现了忠实对等以及在求真务实上的连续对等。黄雯在“黄粱”的物质实体上走向了极限“求真”，保留了金灿灿小米的本体，却因过度拘泥于字面解析，导致译句晦涩难懂，其在处理“of the brain”时的过度显化，反而背离了原诗歌“务实”传播的初衷。布洛克与陈志让则呈现出矛盾的特质，在格律形式上他们试图保持平实，但在“红旗”、“金瓯”等核心意象的翻译上，他们却因过度依赖目标语歌词词汇

(如“crimson banners”、“realm”),偏离了原词的政治隐喻与物质象征,造成了译本整体在语义内核上的“不真与不信”。无论译者的策略偏向何处,他们首要面临的根本矛盾,始终是如何在“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与“保障英语读者理解顺滑”之间找准平衡点。而当这种在内容层面的“求真”与“务实”博弈被投射到具体诗歌形式的再造时,四位译者又呈现出了另一番策略差异。

(二) 格律表达的选择与重构

《清平乐》为双调小令,全词共四十六字。原词上阕四仄韵,下阕三平韵,句式长短交替,倚声填词,节奏明快且错落有致。在跨语际转换时,由于汉语依靠单音字节与平仄声调构筑音乐感,而英语依靠重音与音步确立节奏,这种先天性的语言差异使得原词的古典格律在英译中必须经历一场失真与重构的过程。四位译者在这一层面的抉择,同样投射出鲜明的“求真”与“务实”行为分化。

许渊冲的译本展现了极致的“务实”诗学改造。他彻底放弃了原词的字数、对仗及平仄约束,转而采用英语素体诗的抑扬格与尾韵。其译本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规整而绵密的句末押韵(如首句“rain / again”,下阕“leap / sweep”,尾句“hand / land”)。这种“以韵译诗”的归化手法,是其践行“三美”理论的典型实践。为了迎合英语读者对“音美”的期待,他宁愿牺牲与原诗词形在字面长短上的绝对对等,其“务实”的根本动机,是作为独立学者面向海外文学市场,竭力争取英语普通读者感受到读诗的快乐。

李正栓的译本则呈现出在学术上求真与在表达上务实并存的折中特征。其上半阕在“rain / complain / again / vain”(aaaa)处尝试了连续性押韵,与原诗韵脚一样。在下阕使用aaba韵,如:leap / sweep / bowl / leap,也与原诗下阕一样aaba。这种在格律上的还原式充分表达,并非仅体现了译者对押韵的重视,而且是受其教材编者这一“社会角色”的体现,在“音美”与精准传递教学文本信息有效融合,他选择将教学与翻译融合为一体,有效传递了亦师亦译者的优秀品质。

布洛克与陈志让的译本表现出对英语韵律的极端淡漠。其译文完全采用了自由诗的形式,全篇不设任何尾韵,诗行切分仅仅服务于句法结构的完整与语段停顿,如“A sudden wind gathers clouds / As warlords renew their clashes”。这种形式上的“自由体化”,与他们的行为特征产生了一种矛盾的错位,在格律层面,他们“求真”于原词的不加修饰,看似在形式上没有大碍。结合前文的分析来看,其在核心意象“红旗”、“金瓯”上过度追求目标语的诗性归化,导致译本在语义上出现了本质的“不真”与“不信”,这正是对原词内在“信度”破坏后的必然代价。

黄雯的译本在格律上同样偏向自由体与无韵诗。虽然其开篇“Sudden veer of wind and rain, / The warlords made war again,”有轻微的押韵尝试,但整体节奏完全服从于逐字直译。结合前文中她将“黄粱”生硬地译为“Golden Millet Dream of the brain”的极力求真行为,她在格律上放弃英语诗歌的悦耳性,恰恰与其翻译哲学保持了高度一致。黄雯的“务实”完全指向了

原词字面物质外壳的对等,而绝不向英语音韵的美感妥协,她宁愿在形式上散乱、甚至可读性受阻,也要优先让字面对应得到落实。这种格律选择,正是译者“过度求真”在诗歌形式层面的必然投射。

综合对比这四种格律重构模式可知,格律表达的差异绝非纯粹的技巧高低,而是译者作为“社会人”在诗学观念与出版场域约束下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在四位译者中,许渊冲的译本展现了极高的诗学造诣,他通过精妙的英语韵律再造,成功将原词的“音美”转化为英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诗歌节律。其高度“务实”的策略是为了最大程度追求译作的文学感染力,力求在英语语境中保持原诗的行文气势与音韵节奏,这在文学翻译中属于高水平的创造性发挥。而李正栓则最为趋近于“忠实对等”与“求真务实”的高度统一。他在格律处理上采取了折中平衡之道,其既没有为了迁就英语押韵而强行扭曲语义,也没有彻底放弃英语读者的朗读体验,而是通过上半阕押韵、下半阕尊重语义分行的灵活方式,体现了学术编译器严谨而务实的精准权衡。相比之下,布洛克与陈志让以及黄雯的译本在格律重构上则稍显逊色。布洛克与陈志让虽然采用了散体形式,但因在核心意象“红旗”、“金瓯”上过度归化导致了语义失准,其形式上“求真”与内容上“不真”的矛盾使其整体层次不高。黄雯则因过分拘泥于字面拆解“Golden Millet Dream of the brain”,致使句式生硬晦涩,严重破坏了诗歌应有的文学感染力。以上四种译本的差异,恰好印证了译者身份、诗学追求与目标受众不同而导致的策略分化。在四者之中,许渊冲与李正栓的译本均有效传递了诗歌音形韵,而李正栓在形式与内涵的权衡中,更是达到了求真务实极致平衡的最佳状态。这些基于真实社会属性与出版场域约束而作出的多维度选择,共同勾勒出《清平乐·蒋桂战争》跨文化传播中风格迥异的文学面孔,也为下一章进一步总结译者行为的社会学规律提供了层次鲜明的文本依据。

四、结语

本文以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四种代表性英译本为语料,深入剖析了译者在处理革命政治隐喻、历史文化典故及自然地理实指等核心意象时所展现出的复杂行为模式。研究发现,由于该词兼具古典词律之美与鲜明的革命政治叙事,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着“求真”与“务实”的深层张力。这种张力要求译者必须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诗学追求以及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具体策略的选择上作出差异化的动态权衡。红色经典的外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码操作,而是一场综合了文化杂糅与诗学碰撞的动态社会过程。译者的行为选择,始终受制于其“社会人”的身份定位、目标受众的期待以及出版情况的规范约束。对“求真”的绝对执守,可能使译作难以融入目标语文化,丧失文学传播的魅力。而对“务实”的过度依赖,则可能消解原作承载的历史严肃性与革命立场。因此,面对兼具厚重文化底蕴与鲜明政治导向的经典文本,理想的译者行为不应是迈向连续统的两端极端,而应是在“求

真”底线与“务实”诉求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主要立足于国内外多位代表性译者对毛泽东诗词的译本，聚焦于译者行为的文本实证与策略对比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通过这些译本获得了对毛泽东诗词及其背后文化的深刻理解。”^[10]而对于译者在翻译决策过程中的深层心理动因，以及目标语读者的具体接受效果与审美反馈，仍

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未来研究可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等量化研究手段，借助各种大模型，并结合接受美学等理论视角，从宏观社会场域与微观认知心理的多维视阈出发，进一步深化毛泽东诗词英译中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内涵与实证深度，以期为毛泽东诗词这一红色经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更为立体的理论参照，构建中国翻译自主体系。

参考文献

[1] 李正栓，张丹．毛泽东诗词国外英译群体行为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3(3):17-30+59.

[2] 李正栓，王心．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综述[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26(6):9-18+155.

[3]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J]．外语研究，2013，(6):72-76.

[4]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的动态性[J]．外语教学，2026，47(1)67-73.

[5]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问题[J]．外国语文，2019，35(5)118-123.

[6] 李正栓，郭萍．毛泽东诗词英译中的诗人形象建构[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3)17-23.

[7] 居茂文．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毛泽东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历史解读[J]．新东方，2003，(11):20-22.

[8] 李正栓，张丹．毛泽东诗词中旗帜意象的意义及其英译[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28(3):1-10+158.

[9] 李正栓，苏赛迪．毛泽东《念奴娇·昆仑》的译者行为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6)100-113.

[10] 宋润娟，李正栓．毛泽东《七律·长征》译者群体体认行为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66(4):95-102+154-155.

[11] 李崇月，李静，李文．毛泽东诗词中典故的英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9(S1):1-4+2.

[12] 李正栓，南方，主编．毛泽东诗词英译比录[M]．亚马逊出版集团，2022.

[13] 李正栓，赵静．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厚翻译研究——以《毛泽东诗词精华》为例[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3):80-86.

[14] 李正栓，张丹．毛泽东诗词译者行为研究[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2):14-21.

[15] 李正栓，张丹．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译者行为研究[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30(6):52-66+110.

[16] 李正栓，吕欣．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译者行为研究[J]．上海翻译，2024，(2):55-60+95.

[17] 马冬梅．周领顺译者行为研究思想的系统性发展[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4，46(6):64-86.

[18] 余立霞．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对比研究[J]．外语学刊，2016，(6):106-109.

[19] 周领顺，周怡珂．翻译批评需要怎样的标准？——译者行为批评模型构建尝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5):107-117+138+150-151.

[20] 周领顺，黄鹏鸣，陈龙宇．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称谓问题——答研究者(之四)[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4，46(3):15-29.

[21] 周领顺．翻译批评的跨学科定位：框架语义学视域[J]．中国翻译，2024，45(2):5-13+189.